

徐复观全集

国族无穷愿无极
江山辽阔立多时

九州出版社

论文化

(二)

014037804

K203-53

35

V2

论文化

徐复观全集

(二)



九州出版社



北航

C1725905

K203-53
35
V2

当前的文化问题

——答客问

原编者按：自从胡适博士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中，发表了一篇关于西方科学文明与东方精神文明的评判演说以来，引起海内外文化界的激剧争论。兹承徐复观教授为本报撰写此文，亦系批判胡博士的言论，我们对于徐教授的若干观点和语意，虽然有不同的见解，但以其为本报近月来所收到反驳胡博士的文章中最有分量之作，故乐于分期刊布，借以增进学说辩难的气氛，亦文坛盛事也。

我在《民主评论》十二卷二十四期发表了一篇《中国人的耻辱，东方的耻辱》的文章后，有的朋友赞成，有的朋友不赞成。兹将跟一位朋友的谈话经过，纪录下来，借供关心此一问题者的参考。

客：你和胡博士也很熟，但你在这篇文章中对他的口气未免太过分了一些吧！

主：是的，我也觉得如此。胡博士在东亚地区科学会议的讲演，是去年十一月六日；我在七日看到报纸的记载，便提起笔来写那篇文章，寄到《民主评论》。过了几天，我一想，现在打

胡乱说的人多得很，从长久的时间看，都不过是过眼云烟，随即消散了，何必独与胡博士计较。所以又写信给《民主评论》的编辑先生，请不必发表。以后看到台湾的报纸杂志，居然对此一讲演，还有人在大捧而特捧，有位美国人也在恭维那是最高智慧的表现。我又想，文化上的是非、人情上的轻重，本来常是见仁见智，不足为异。但胡博士以包小脚来代表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只有很少的灵性，乃至没有灵性，这实际是说中国人、印度人不是人。因为凡是人，即使是黑人，便有灵性，这是去年十一月在美国费城学士会馆所开的第十七届人类学会所作的对人种决议案所共同承认的。关于中、印两大民族过去是人不是人，这种是非问题，一般人应当能够辨别。以五千年的历史，拿来和胡博士一个人比较，这种人情上的轻重，在心理正常的情形之下，也应该是能辨别出来的。那篇演讲辞里面，名词观念的混乱，稍加分析，可以说是不知所云，这只要有大学三年级的程度，也应当可以分辨得出来的。但今日有些中国人，把这种起码的是非，置之不问。觉得一口气把几千年中的圣贤、文学家、艺术家、为守其所信而流血的忠臣义士，加以诬蔑、抹煞，是理所当然，大快人意；但谁个沾到了胡博士，便觉得是大逆不道，群起而攻；我感到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的颠倒情形，未免太可悲了。所以我又去信给《民主评论》的编辑先生，要求将拙文以本名发表。胡适可以用诬蔑的方式辱骂中国、东方的文化；我便可以说理、说事实的方式来教训他。纯从私人说，我不仅很敬重他，并且也很爱护他。但把他和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分量比较起来，那就太不成比例了。

客人笑道：你也说起假话来了，这样骂他，还说什么……

主：我常常想，社会之可贵，便在于它有许多不同的思想，也有许多不同的对文化的态度。一个人，只有在不断地与不同的思想、态度发生交往、较量中（主要是通过阅读而在自己思想、精神中交往、较量），才能扩大自己、充实自己。我从民国十六年起，便突然彻底反对线装书，尤其反对我十几岁时所学的桐城派古文和宋明理学。一直到民国三十六七年，态度才慢慢转回。我是一向对书本有兴趣的人，在中间这段很长的岁月中，自然读了不少时下的东西，包括胡博士的著作也在内。在我的回忆中，他的文章，虽然从来没有对我发生过什么影响，这大概因为其中，绝大多数缺乏思想性的内容的关系（追求思想，恐怕是比较聪明一点的青年人的自然倾向），但也决没有什么反感。十多年以前，我曾站在政治的立场，认为国民党不能与自由主义者合作，是一最大的损失，而提出过呼号。以后，我自己也自然而然地走向“理想性的自由主义”，这是由中国文化本身所自然导出的结论，除非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从自由主义这一大方向来说，我也应当尊重胡博士。所以在一九五二年胡博士返台时，有位朋友和我说：“你看胡博士到底有什么学问？大家都捧他。”我当即答以“你不要从纯学问的立场去了解这种情形……”那位朋友点头笑，后来这位朋友非常捧胡博士，当不是因为我一句话。一九五七年（或者是一九五八年）他来东海大学，我和张佛泉先生首先发起大家共同宴请他，并且曾经很诚恳地写过一封信劝他，希望他以现在的年龄、地位，应当作文化的保姆，而不必再以斗士的姿态出现。意思是说向团结方面去领导大家。这并非有求于他，都是为了文化、为了维护他。不过这番敬意，现在没有了。

客：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次的讲演呢？

主：不是。并且不是出于瞧不起他的学问，中国敬老尊贤的传统，不一定以学问来衡量的。因为这几年，我发现他对国家、社会，乃至自己本门的文化问题，没有一点责任心；对于国家的困难、人类的危机，也没有半分感触，而只专心致志地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如何维护在学问上毫无出息，而只捧着他的招牌吃饭的几个人的地位。文化学术的地位，是要用文化学术的成就来维护的。他的科学方法标语、《红楼梦》考证、杜威的蚌壳知识论（只能以蚌壳作比喻地讲）、神会和尚，赵、戴对《水经注》的校注，是谁偷谁的问题，都一一拿出来过，大概内心总多少觉得还有点不够，于是不断地提出共产党清算他的文章有几百万字，以证明其重要与伟大。又公开说某某是圣人，以见专门捧自己是圣人，则被捧的自己更圣得可知。这种心理状态，对一般人来说，倒可原谅。但他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早在中国的学术地盘，居于统治者的地位，这一套对于他有什么必要呢？大概他感到仅仅上面那样做还不够，所以便不如再进一步，把自己和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彻底对立起来，再以彻底打倒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英雄而出现。这样，便自己觉得是西方的代表，而可再得到一些热烈的掌声。其实，真正的学术工作者，是把一个个的问题在有关的资料中，小心谨慎加以处理。世界上，早发现不出要打倒那一整支文化系统的读书人了——即使是把共产世界也包括在内。胡博士的心理状态，有些像晚年希特勒的心理状态，这实际有失他自己的尊严，我对他的敬意便自然消失了。

客：不过，你说他不懂文学、史学、哲学，那未免太过吧。

主：我希望你看看胡秋原先生在《文星》九卷三期的一封长信，标题是“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里面虽然有

的地方我并不十分赞成，但他在一番无可奈何的心情之下，总算把问题摊开了。就我所知，秋原是一个决不愿伤害胡博士的人。但他不仅读书读得比胡博士多，并且他比胡博士是肯留心于世事、文化的人。胡博士的一套，他心里早已有数，这次却倾吐一点出来了，不妨看看。

客：我大概翻了一下，因为怕他的长文章，没有细看。

主：不错，前天我同另一位朋友谈到时，那位朋友也是对他的长文章有些望而生畏。但他的长文章中有不少的内容，尤其是这一篇。至于我对胡博士的了解，却是有一段经过的。大概是一九五三年，我在台中省立农学院教国文，想在《胡适文存》中选一篇作国文教材，选来选去，选了一篇《论短篇小说》。等到油印出来再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再经过教室的讲解，才恍然于他所说的许多话，都是对问题沾到一点边，或者是似是而非的话，没有一句说到问题里面去。在一九五四、五五年，我因宋明理学而关涉到禅宗问题时，又发现他的考据态度的武断，是足够惊人的，更恍然于为什么有一个日本人称他为“主观的考据家”。至于说到思想方面，因为他只有聪明而没有分析的能力，大概他很少读过西方比较严肃性的有关著作，如果读也读不进，那更根本无法谈起了。我在东海大学开中国哲学思想史，首先也参考到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其中除谈到《墨子》一部分稍有可取之处以外，只有用幼稚两字去形容。一九五八年（或是一九五七年）有位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北大出身的朋友到东大来，同我谈到胡博士，说他对文学的看法，没有一点是与胡博士相同的。我说：“你和他谈过吗？”他说：“谈过，无从谈起。因为每一问题都有若干专著在后面作背景，而他都不曾读过，他太缺少讨论问题所必不

可少的预备知识。”学问是要人不断去追求的，光阴一晃眼便过去了，看些与学问无关的消闲小品，以满足志气低沉的趣味，这和看武侠小说一样，学问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客：然则他当年为什么一举便成了大名呢？

主：这有它的道理。不过，话须说远一点。中国的传统学问，经过了八股、阮元集团、今文学派等的分工合作，实在讲得固陋、荒诞得一无价值了。看了廖平的著作，谁能知道他说些什么？章太炎负了当时的大名，并且以中国文化的传承者自命，但稍有点头脑的人，谁能在他的大著中，发现出中国文化尚有点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所以他的得意学生，多成了打倒中国文化的健将。简括的说一句，清末民初，讲中国文化的人，从时代所需要的思想而言，实在应当倒下去。胡博士当时打着科学的招牌，与陈独秀们登高一呼，自然有如摧枯拉朽，使人耳目一新。他本是一个聪明人，英文学得不坏，在哲学上拿出杜威，在文学上抬出易卜生，虽然都只是一点皮毛，但对于当时的腐朽冬烘，已够他们手足无措了，并且这也实在有其时代的意义。他当时成了大名，我认为是应当的。但胡博士却不由此好好地努力下去，自西方学问的某一种部门深入，更不了解他们所打倒的是如上所述的——是假中国文化之名变戏法的腐朽势力，并不是打倒了中国历史中足以代表文化的许多主要思想，而这些思想，都是他所不曾了解的。这也难怪他，当年年纪轻，便由此志得意满起来，想以他的考据、辨伪工作，完成他的打倒中国文化的大业。他因为没有思想训练，没有分析能力，接近不了历史中真正的文化问题，而只在外面绕圈子；圈子越绕越远，在《水经注》的赵、戴之争上便绕了十多年。有位朋友在谈天中谈到这件事时说：“他最后拿笔迹给我们研

究，假定从笔迹判断，他老先生的官司便败诉了，只是大家不好扫他的兴。”在美国住了这多年，西方思想家在两次大战后，为人类前途，为学问本身，所作的各方面的探索，他似乎都未注意，而只是背诵着自己三十多年前的大作。一个对学问有诚意，对文化有诚意的人，会这样吗？他的自由主义，实际是魏晋人的清谈的性格；自己生活于富贵之中，却表示另有高情远致。他的心情，实际与明末士人好玩小摆设的心情没有两样。但却要高谈阔论，讲许多为自己所不了解而实际只有一股虚矫之气的门面话，以此来接受旁人对他的供奉，那实在是令人难过了。

客：你是不是因此便觉得他不配当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呢？

主：不是。他只要自己真正知道一点“三无主义”，凭着他的老招牌，保持住一点学术界的清洁，让大家能放胆做点学问，倒也是好的。但结果，他们的排斥异己、专横垄断，以文化上的既成权力来压迫学术自由，其干扰性，绝不在许多政治干扰之下。有一位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先生，同我谈了天后，感慨地说：“我这些话，假定公开地说出来，饭碗便成问题。”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考古学没有后来文化中可争论的问题，所以可以免于他的干扰，而有卓越的成就。语言学因为有人在美国吃香，因而得到鼓励，也稍稍有点成就。除此之外，一般人很难作有知识系统性的研究工作，绝不敢接触到思想上的问题。今日谈科学方法的，出来了多少长篇短论的研究著作，但他的门下，始终只敢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两句话，这是如何的可笑。老实说，今日在精神上不突破胡博士的闭锁王国，固然接触不到中国传统的学问，更接触不到西方的学问。在他的黄金时代，清华大学的名教授金岳霖已公开说“西方名理之学，非其所长”；他实在与西方学问，

过于缘远了。不然，他便不会以这种横蛮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

客：胡秋原先生的文章，提到他和你吵过架的事，是真的吗？

主：是真的。我和秋原吵架，记忆中有三次。一次是在重庆南方印书馆，为了他反对军人当封疆大吏，而我认为军人也可以当，两人大吵特吵。事后想起来，我非常惭愧，这一次是他百分之百的有理。第二次是在香港民主评论社，他觉得同样的道理，中国也有，外国也有，便不必一定要谈中国的。我觉得假使同样的两只茶杯，一只是从街上花五毛钱买来的，一只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人性总觉得祖先遗传下来的更可宝贵，所以应先从中国谈起。其实，现在看起来，都可以同时认真的谈，只是有时为各人的学力所限。第三次是在他的家里，吵得更凶，后来好像是他太太买西瓜和解，大概也是这类的问题，可是内容一点也记不得了。不过即使我和他吵到打破了头，我也对他保持敬意，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刻苦读书的人。

客：那末，你是不是胡秋原先生所说的传统派、复古派？

主：传统派的名词，可以成立。复古派的名词，在学术思想上，是不能成立的。并且今日若从生活行为的坏习气这一方面来看，我们的朝野上下，每一个人都在复古，而且是集古今中外的大成。若从好的要求方面来看，则我们朝野上下，不仅没有人复西洋之古，也没有人复中国之古。譬如公私义利之辨的古，有谁去复它？再进一步说，所谓古，是指的历史中的哪一朝代？而在同一朝代中，又是复哪一时期、哪一方面呢？若就各个人来说，则应该把问题分三方面来看。第一，是属于个人生活兴趣范围以内的事，只要不是伤风败俗，只要不是把自己的兴趣强加于他人

身上，便都无是非得失之可言。长袍、西装、中山装、张大千先生的东坡帽；做旧诗，只读而不做；做新诗，做超现实主义的诗，都是从人所好。我现在变成了不能用毛笔写字的人了，但我又决不能横行写，这怎样来判断我的新旧得失呢？所以胡博士骂做旧诗的是下流，这是最不想道，最缺乏民主修养的。第二，是属于各人学问研究范围的。到了今天，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学问上研究的题目。在许多研究题目中，“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在这一方面，我们只应追究研究的结论是否正确，而所谓正确不正确，不是以适合于某些人的兴趣为准，而是对于被研究的对象所能作的解释程度为准。至于研究的题目，没有争论可言。不过研究每一题目，在整个学问中来说，自然有由其所发生的影响而有比重的不同。胡博士的闭锁王国，在这一方面最可笑，最表现他们是承继阮元这一派的情形是：视研究宋明理学心学的人为大逆不道，除非得出的结论是合于诬蔑古人的目的。试问：慈禧太后、军阀，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为什么影响中国千余年历史之久的宋明学不可成为研究的对象？这是太无知无识了。第三，是对研究结论所作的价值判断。这一点，若就历史中的问题来说（可以说，决没有不含有历史性的文化问题），也可以分为两点，一是某种思想、制度，在当时价值如何？二是站在现在来看，对现在还有无价值？在历史上有价值的，不必到现在还有价值。现在没有价值的，不必在历史上亦没有价值。二者不可作混同的论断。可是文化上真正的争论，都是从这里发生的。我想一个做学问而又关心到国家、民族、世界的现实问题的人，总会含有学以致用的目的。“思以其道‘益’（治）天下”，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的态度。“思以其道‘易’（改变）天下”的，这是带

有宗教性的思想。若仅就一个关心世运的学人来讲，则“思以其道‘益’天下”，那总是应当的。而由此所发生的争端，也并不是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即是：看他所作的判断，是否与历史上的问题相对应。举例说，胡博士写了一篇《神会和尚传》，以为他把为南禅打天下的大功臣发现出来了。殊不知神会（荷泽）这一宗，与南禅的青原、南岳，在当时他们已各分得清清楚楚，并且互相讥讽。荷泽宗大约是四传而绝（圭峰宗密后改归华严澄观），以后一千多年的南禅天下，都出自青原、南岳系统，与神会毫无关系，所以他对神会的价值判断，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对应的。至于他想由政治和尚神会的谎言，以否定禅宗、打倒佛教，这比由证明上帝七日不能造人之说，以图打倒基督教更为愚妄。今日的许多争论，常常把上面所说的三方面的意义混淆在一起，所以越争越胡涂了。稍稍严格一点说，文化学术的争论，应以第二项为主。第三项的争论，乃是一种主张的争论。这种主张的争论，就学术界讲，应以第二项成就的正确性、范围的大小性，作为一个重大的（但不是唯一的）基准。在文化落后的阶层中，最容易流行两种情形：一种是偶像主义，另一种则是势利主义，看风转舵，向高帽子磕头。在学问一无所得的人，只有崇拜偶像，但这只是阻碍前进，还不至于从根破坏文化。顶糟的是今日流行的偶像主义，除了培根所说的四种以外，最多的是“衣食偶像”，即俗语所谓“有奶便是娘”。再由此向下一步，便是势利主义。拿现实的势利眼光来谈文化，这才是彻底破坏文化的大敌人。把这两种因素合在一起，便是捧打主义，不捧便打，很少在捧打两方式之外，平心静气的来谈是非，更不肯翻开书本来研究学术争论上的是非。由势利主义所产生的附带品，便是一种栽诬戴帽子的作风。例如居浩

然、虞君质，再三把义和团的帽子戴在我头上，准备假手于洋大人来干掉我，这又何必呢？

客：你说了半天，你在胡秋原先生所说的“三派”中，到底属于哪一派呢？

主：我都不够格。这一年多以来，每当人家骂我没有学问时，我从来也不生气。因为面对学问的自身而言，我不仅没有学问，并且我常想，中国只有许多人比我有学问，这才有点希望。所不幸的是，这几年写文章骂我的人，他们的出发点常常不光明，而且比我的书读得更少，更没有思考的能力，结果，不是人身攻击，便是栽诬到某一门学问的本身，这真是一种可悲的现象。譬如有人骂我：“不过是朱元璋的学问，不过是《四朝学案》的学问。”其实，我每天所从事的，既未尝以此自限，更不敢以此自当。我非常推尊朱元璋，但在写的有关文章中，很多地方都批评到朱元璋，然并不因此影响到我对他的尊敬。假定在我断气之前，自己反省，能真正了解朱元璋，能真正了解《四朝学案》，我便会很安然地闭上眼睛。

客：那你也是如胡秋原先生一样，是想“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的吧。

主：就学问方面说，除了俄化派太危险，我不沾上它以外，我不仅希望有许多真正的传统派、西化派的出现，并且我希望在两大派中能真正出现各种的专派。假使有人以一生之力，作了以某一家为中心的研究，因而他的精神无形和被研究的某家同化了（虽然实际上不可能），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例如有人孔子化、孟子化、老子化、程朱陆王化、李白化、杜甫化、柏拉图化、亚里士多德化、康德化、杜威化、莎士比亚化、哥德化，只要他知道

他所“化”的乃是“万化”中的“一化”，而不要“思以道易（改变）天下”，那有什么不可以呢？并且只有如此，则作为一个大群体的国家、民族，才能自然而然地对文化作有内容的融化，而形成有独立性、创造性的文化。我认为能“化”才能创造；能创造，便自然超越了。否则一下子而言超越，便将无从下手，结果会落空的。今日的文化问题，若只就知识分子本身说（当然有知识分子以外的问题），问题是出在大家不好好地读几部有关的厚本书，自己除了“食色性也”以外，什么也不化，却又不知天高地厚地“思以‘身’易天下”，这便真是无法可想。至于我自己，已经说过，什么也不够格。但若就我追求的方向来说，我愿作一个文化上的正统主义者。我常感到在一条滔滔不绝的大河中，不管它的河面有多宽，总能发现出一条中心的流线。在东西文化的大流中，似乎也有这样一条中心线，有时浮出上面，有时潜在底下。只要不为一时的激滩暴流所眩惑，肯细心地追溯，好像总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并且在东西文化的中心线上，实际是可以互证互益，而没有什么排斥性的。我愿以余年来追寻这条中心线。在这条线上安顿我的生命，不管能追得到多少。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自由报》

自由中国当前的文化争论

以去年十一月六日胡适先生在亚东地区科学会议席上发表了第一篇讲演为中心，自由中国最近又爆发了一阵文化上的争论。问题的中心，可以概括为两点：一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还有没有若干价值的问题；胡先生的答复是一个“否”字，另外有些人的看法则是一个“是”字。二为中国文化能不能与自然科学技术并存的问题；胡先生的答复是“不能”，另外有些人的看法是“不仅应当”，而且也是“可能”。

一

说来，这不过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老问题。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完全面临着亘古未有的新情势。在当时，传统文化，对此一新情势，是表示无能为力，欲求自救，势必另辟新途。这便发展为一连串的“洋务”、“维新”的运动。而在中国文化自身方面，从乾嘉考据学风盛行以来，一般考据者的内心，都是为了逃避现实；他们研究的成果，也都是文化中的枝节问题。所以中国文化的精神何在？价值何在？一般传统的知识分子，既不曾潜心研究，也不能知其所以然。因此，百年以来，凡是维护传统文化

的，出于感情者为多，出于问题的反省、理论的反省者甚少。在这一阵营中，挺身而出的，多是桐城古文派下的文人，即其一证。我们谈文化问题，并不能轻视这种感情作用。因为在一切动物中，只有人的生活才有这种感情，所以这也正是表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乃至价值。不过，仅凭感情，是不能受到长期“事与愿违”的考验的。在与西方物质成就的显著对照之下，有的人既以感情来维护中国文化，便也有人奋起而以感情来彻底反对中国文化。在彻底反对中国文化阵营中，依然是以带有文人气质的人为主，后来则有的变为狂热的社会运动家，这些都不是学者型的人物。同是出于感情，但在彻底反对中国文化者的这一方面，却有西方物质成就的强大背景，及科学与民主的伟大武器。在此一显明对照之下，维护中国文化的阵营，早已溃不成军。当时作为传统文化重镇的章太炎先生的门下，纷纷加入到反对阵营中去，有的并成为彻底打倒中国文化的急先锋，例如太炎的大弟子钱玄同主张将中国的语言也应该废掉，这都是当然的现象。

二

胡适先生在当时是以提倡白话文及杜威思想，与《红楼梦》考证，而成了大名的。在我的回忆中，《红楼梦》在五四前后之所以风行一时，并不是因为它的文学价值，而是象征当时的男女学生开始可以公开谈恋爱。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站在文学的立场来了解《红楼梦》，尽管不少人把写实主义这类的口号加到它身上去。至于考证性的“红学”，则完全变成了满足少数人